

夏鑄九

Chu-joe Hsia

Hall, Peter(1988),*Cities of Tomorrow: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and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在勒·柯必意 (Le Corbusier) 的革命性小冊子 (*The City of Tomorrow and Its Planning*, 1929) 出版了 60 年之後，彼得·霍爾 (Peter Hall) 以類似書名對二十世紀的都市規劃與設計的知識史提

出了一種與柯必意全然敵對的詮釋角度。

霍爾的這本新書在台灣已經可以買到，就本地讀者之需要，值得就作者之寫作脈絡及正文本身略加評介。彼得·霍爾是英國的地理學者與規劃學者，50年代在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57年至1967年，霍爾任教於倫敦大學之柏白克學院(Birbeck College)與倫敦政經學院。然後，霍爾出掌雷汀大學(The University of Reading)地理系主任(1968~1980)。在1980年前後，柏克萊加大之城市與區域規劃系為維持其領導地位，先後爭取霍爾與曼威·柯司特(Mannel Castells)於歐洲。目前，霍爾分別於春秋兩季輪教於柏克萊與雷汀。

霍爾早期之興趣在於都市工業區位方面，兼擴及全球大都會之規劃問題，表現在其著作之中如：《London 2000》(1963, 1969 修訂再版)、《The World Cities》(1966, 1977 及 1984 修訂再版)、《The Containment of England》(1973)《Planning and Urban Growth: An Anglo-American Comparison》(1973, 與瑪利安·克勞生(Marion Clawson) 合著)，這方面之近著則可加上為英國的規劃史學者東尼·沙卡利夫(Tony Sutcliffe)所編的《Metropolis 1890~1940》(1984) 貢獻一鳥瞰式之導論。

霍爾近年之研究除繼續於比較都市化方面，如《Growth Centres in the European Urban System》(1980, 與丹尼斯·海(Dennis Hay) 合著)，亦涉及規劃決策之失敗問題如《Great Planning Disasters》(1982)，這本影響廣大的著作尤其值得當前台灣推動六年國建計劃時做為警惕與記取教訓。霍爾曾致力於英國內城地區之研究，集為：《The Inner City in Context》(1981)，以及歐洲都市捷運規劃：《Can Rail Save the City》(1985)。

目前，霍爾在下述領域投注心力：1. 廿世紀之規劃史，如本書。
2. 高科技工業之區位與成長《Silicon Landscape》(1984, 與安·瑪庫森(Ann Markusen) 合著)、《High Tech America》等等。

霍爾的《明日之城市》一書不但值得博士班的學生在研究規劃與



設計理論的論述歷史時做為參考，也可幫助碩士班學生接受規劃與設計論述規範時，了解專業價值形成的根源以及理念落實時的矛盾與扭曲。甚至，對大學部的同學，無論是空間的相關專業的，還是其他科系而對規劃與設計專業有初步興趣的學生，本書就專業者的視野建構過程，提供了一個能統合全局的視野，值得推薦。

霍爾自謙本書非原創性研究，而是綜合性成果。然而，相較於既存的都市與規劃史著作，本書之貢獻卻在於：在一全新的知識脈絡下重組既有的材料，改寫了規劃與設計之歷史。因此，與其說《明日之城市》是都市史以及規劃史之著作，不如更準確地說，霍爾其實是經由歷史的詮釋，重新建構了規劃之論述（planning discourse）——他由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資本主義城市的危機中形成的規劃運動之安那其主義根源，一種無政府主義的社會主義傾向開始，勾勒出專業者對資本主義城市反應之線索，清理歷史之迷宮，重繪歷史之循環。對霍爾言，20 世紀之規劃中不過是一些主要的理念一再地迴響、再循環與再連結。

《明日之城市》討論昨日城市塑造之歷史，配以對其視野之描述性主題勝於編年（如政治傾向對都市設計風格、公共考量對私部門發展、都市主義對郊區主義、觀土地使用管制對反土地使用管制等規劃課，上下一百年有幾（1880~1987）。

霍爾由 19 世紀末資本主義城市惡夜中的維多利亞貧民窟（1880~1900）開始，經由鐵路推動的城郊化與城市擴張、花園市、區域城市之展望，以及與之相對比的城市美化運動對紀念性城市之追求與權力的表現（1900~1940），對規劃師的先行者一一著墨。然後，由何必意式集權式規劃的幅射城市與父權城市，（1920~1970）對比到綿延至今的，由社會運動中成長的自主性社區對城市的憧憬（1890~1987），汽車的城市，（1920~1987）到近三十年學院體制生產的，由理論建構之城市（1955~1987），以及，當社會運動與學院之理論均無由改變社會結構與城市時，現實就會反過來改變城市——伴

隨著全球性的資本主義再結構，資本徹底瓦解了規劃（1975～1987）。我們可以說，霍爾著重處理了近年來規劃論述中的辯論與爭議，並分別追溯它們的知識根源。最後，他在當前都會區兩極化的趨勢下指出最底層人民的城市，這竟然是 30 年代資本主義危機以來並沒有解決的矛盾。

霍爾的《明日之城市》中最獨到之處可能在於處理“想像的城市”的發問角度。由於本書旨在處理人們對城市的視野，以及，它們對城市營造的日常工作的影響，因此，霍爾重視剝除原有規劃理念的重重歷史覆蓋，以及，分析“橘越淮而為枳”所面對的規劃理念在時間空間中，在社會政治氛圍中之移植性質（頁 2～3）。簡言之，霍爾在困難的重建工作中，清楚地表達：規劃論述並不等於現實中日常的城市營造。換句話說，我們必需區分空間實踐不同層次間的關連——規劃論述實踐是一種象徵實踐，它與營造實踐的連結、差距，及其自主部分需要細緻處理。所以，規劃之歷史寫作並不在於研究者以理論，或者理性，去重組理性化之意圖、原因與效果，規劃之歷史寫作正在於處理規劃理念如何，以及為何在現實中執行，以致於伴隨著的矛盾、衝突、無奈、增添的政治社會過程。

其次，在這本 80 年代末的著作中，霍爾也避免了 70 年代結構主義的理論陷阱。當他的同事柯司特質疑開文·林區（Kevin Lynch）的皇皇巨著《Good City Form》（1981）：與其說我們需要“好的城市”之理論，不如說，我們需要面對城市的“好理論”（Castells, 1983）。霍爾則似乎以此書應之為：整個 20 世紀之規劃史為“好城市的另類替代視野”。霍爾之歷史詮釋著重指出：規劃師並不像過去的結構主義者所宣稱的那樣，認為規劃之宣告為資本主義系統之反應——特別是指資本主義國家，它組織生產的問題與連續性之危機。一旦僅止於如此，規劃就淪為資本主義系統需要他們時，不早不晚會出現的靜態棋子與政治安全瓣罷了。霍爾雖不至於全盤拒絕前述論點，然而他的眼光却投注在人類行動者反作用時之複雜性與變動性之上

(頁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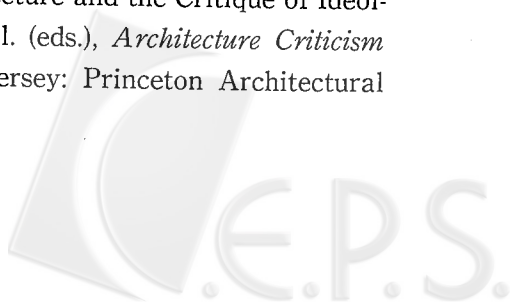
也正由於此點，霍爾質疑部分學院裡的左翼，如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在批判了專業論述意識形態的歷史限制之後，却退回象牙塔的做法。所以，類似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對曼菲德·塔夫利 (Manfred Tafuri) 之早期前衛主義烏托邦批判質疑，而期望專業實踐能力 (Jameson, 1985)，霍爾也肯定約翰·佛斯特 (John Forester) 的規劃行動理論建構，然而，却仍不滿足於佛氏借取哈伯瑪斯之德意志哲學，認為佛氏對實踐之處方仍未逾老的民主派之常識，保羅·大衛道夫 (Paul Davidoff) 在十五年前提出的辯護式規劃 (advocacy planning) 之原則。因此，他對當前保守主義霸權下專業的形式主義、實用主義與理論、教育之間的脫節現象深以為憂 (頁 339~340)。這正是理論生產之“離題”，與專業者之形式主義、親企業傾向間的分離，這也一種專業論述與社會現實間的“精神分裂”癥候吧。

假如不嫌挑剔的話，霍爾無法區分倡議式規劃與佛瑞斯特進步規劃的行動理論實在於霍爾本身之唯心論認識論限制。霍爾的歷史詮釋角度可以接受，然而，本書實際的正文却未見得盡符其自身理論之期望。這或許也是自由派經驗論的理論疏漏：將主體性模糊為意志論的課題。因為霍爾自己也承認，他建構的是規劃運動的神殿，所以規劃論述的歷史就成為知識精英的名人錄，本書之插圖透漏了聖殿中陳列的規劃英雄們的個人肖像與剪影，由查理·布斯 (Charles Booth)、雷蒙·安溫 (Raymond Unwin)、伊伯利沙·霍華 (Ebenezer Howard) …一直到柯司特等等。同時，這些聖賢先祖清一色都是男性 (這不異外)，不但如此，這其實是盎格魯中心的英美經驗，餘僅聊備一格而已 (Ellin, 1991: 57)。社會作用者之於社會結構，仍然有太多的環節需要由制度、論述等層次澄清實踐所植基的與應認識的歷史力量。或許，社會歷史的行動者如何在動態的，充滿了矛盾的與無窮的可能性的社會政治過程中戰鬥？它如何得以採取主動，因應時勢，調整角度？這裡對理論診斷的要求正是需要結合規劃的理論 (行動取向的理論) 與

規劃所需的歷史分析理論。規劃理論需要規劃中的理論，也就是歷史理論對現實的具體分析提供判斷的能力。需要在實踐過程中對歷史力量的掌握，實踐需要的是歷史知識給予的判斷。一如有經驗的獵手，他對森林的知識提供了他智慧與判斷的能力。而他由何處得到這種知識？它來自於獵人過去的實踐。這樣，台灣的社會就不能由基於官方文獻與角度而提出“邊緣的福利主義”(peripheral Fordism)的觀點可以解釋的。它固然可以用來掌握香港與新加坡的現實，香港模型也正是霍爾建構“企業區”的原型，嘲諷的是，這也是為保守黨政府所借用，並扭曲與添加對移民之控制與相關法令，以致於為霍爾所急欲撇清的關鍵。然而，對於同為四小龍的台灣社會與國家關係言，以此做推論，終究嫌太採照官方說法而點錯了現實的穴位。

參考書目

- Castells, Manuel (1983)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 Corbusier (1929) *The City of Tomorrow and Its Planning*, London: John Rodher. (Reprinted 1947, Architectural Press)
- Ellin, Nan (1991) "Rev. of Cities of Tomorrow", *Design Book Review*, No. 21, Summer, pp.57-59.
- Forester, John (1989) *Planning in the Face of Powe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Jameson, Fredric (1985) "Architecture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in Ockman, Joan et al. (eds.), *Architecture Criticism Ideolog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pp. 51-87.



Lynch, Kevin (1981) *Good City For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